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form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国有企业改革与 中国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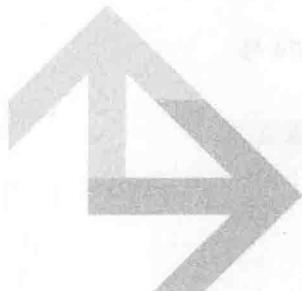
张文魁 袁东明 等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文库
◎ 改革与增长研究子系列
◎ 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
◎ 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文库
◎ 改革与增长研究子系列
◎ 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form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国有企业改革与 中国经济增长

张文魁 袁东明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张文魁等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5

ISBN 978 - 7 - 5095 - 6140 - 9

I. ①国… II. ①张… III. ①国有企业 - 企业改革 - 关系 - 中国经济 - 经济增长 - 研究 IV. ①F279.241 ②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3074 号

责任编辑：贾延平

责任校对：胡永立

封面设计：田 咨

版式设计：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l.cn>

E-mail: cfepl@cfepl.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840413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960 毫米 16 开 16 印张 238 000 字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37.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6140 - 9 / F · 4951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010 - 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 - 88190492, QQ: 634579818

前 言...

本书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基础领域的一项研究成果。重点基础领域的研究至今已经持续3年，由我负责的国有企业研究团队，希望能够在长期以来形成的国有企业研究既有框架内取得一些新发展，所以决定在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着力研究。当然，研究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一片无人关注和无人进入的全新领地，但这个领域的确缺乏足够的开垦，也存在巨大的需要耕耘和收获的空间，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正在进入一个深刻的变革期和重大的转折期。对国企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在这两者之间建立可信的逻辑联系和可算的数量关系，不但有学术价值，也有政策价值。

经济增长不但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政策关切，也是经济学中的前沿领域。在过去几十年里，关于经济增长的学术研究已经非常形式化了，实证分析也非常透彻。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中是最接近于“科学”的那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研究进行细致思考，那么显然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研究向所谓的“前沿”走得越近，它离开现实也越远。经济增长研究基本上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它在宏观经济学框架下越精致，实际上将与微观经济学越来越脱离，它越来越无意或有意地忘记这一要害：宏观经济的增长的基础是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增长研究所关注的劳动、资本、生产率，乃至研发创新、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

这一切是自动生成和自动发生的吗？不是！这一切都由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来生成和发生。如果没有企业的活动，劳动、资本等要素以及研发创新、知识创造等创造性因素，又如何能够进入到经济过程中去，然后造成经济增长并继续内生延展下去？可惜，这些简单的道理却被宏观经济学抽离掉了。其实，在斯密那个时代，并没有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分离，密斯反而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揭示经济增长（斯密，1974）。当然，斯密本人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而没有重视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因为那时企业并不发达，但分工也日益细化，分工现象也日益普及。第一个比较重视企业在经济增长中核心作用的经济学家，应该是19世纪末的马歇尔（2005），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企业在英国已经比较发达了。遗憾的是，马歇尔的体系20世纪以来被肢解了，对企业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分析被大多数经济学家忽略，即使备受推崇如熊彼特者，也没能足够地克服这一点，而且后来出现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日益分离。尽管Coase（1937）在20世纪30年代开创了企业理论，但这一微观经济学理论流派也与宏观经济增长体系格格不入，甚至也较难于融入主流经济学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经济发展的热潮中，能够富有洞察力地从企业发展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量的经济学家之一，是美国经济学家Leibenstein（1957, 1966, 1979），他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学术生涯中，对企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清晰的分析，并精到地分析了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遗憾的是，他的学术遗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很好地继承，仅有Baumol（1995）等少数优秀的经济学家继续沿着这一学术方向走了下来。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主流经济学中的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不到应有的高度重视，而企业研究要私集中于公司制度和公司治理领域，要么更多地活跃于商学院，

如已经享誉全球的美国学者波特（2005）的有关研究就属于此类。这种状况不但使企业理论失之于偏狭，也桎梏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进展，以至于有识之士感叹，经济增长理论看起来不断进化，但实际上少了一个最关键的环节——企业和企业家精神（Audretsch et al, 2006）。这个最关键的环节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是“失去的环节”（missing link）（Acs and Audretsch, 2004）。

21世纪以来，经济学界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宏观经济的增长的经济学家开始多了起来。Banerjee 和 Duflo（Banerjee and Duflo, 2005）对于经济增长的微观视角被认为是中肯的，不过，就研究的技术方法而言，要寻求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融合的确很不容易。他们试图在既有方法的框架内来寻找新视野，这种努力仍然赢得了很多称许。Hsieh 和 Klenow（Hsieh and Klenow, 2009）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当然，毋庸讳言，他们的方法仍然是在生产函数和生产率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但是，想一想，这不恰恰可以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间搭建一座简易的桥梁吗？所以他们看似并无重大创新的方法实际上开启了新的视窗。他们的研究启发了很多经济学家，此后，Brandt 等人（Brandt and Zhu, 2010）发表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其他学者也不断沿着这一学术路径进行更加广泛的研究，在过去几年里出现了不少很有创见的研究成果。

我们这项基础研究，就是基于对宏观经济的增长研究脱离于微观企业基础这一现象的不满，就是沿着过去十几年经济学界对这一不满做出反应所开辟的学术路径而开展的。我们力图使本项研究更有特色，更有脉络，更有质感。更有特色，是将我们的研究集中于最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群体——国有企业，而且这一企业群体对中国一些重要行业仍然具有控制力；更有脉络，是将国有企业放在中国经济从启动工业化到增长阶段重大转折这样一个为时

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完整而又客观地认识和分析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有质感，是试图跳出了经济增长本身来分析经济增长，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除了政治社会安定和资源环境允许等方面的因素之外，本质上是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顺利变迁、产业成功升级的过程，更是这个国家的主要企业群体的竞争优势及时更新和核心竞争力得以重建的过程，从而我们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对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升级的影响，以及国有企业是否可以通过重组来实现竞争力重建。因此，我们认为这项研究是具有学术价值的。当然，我们对产业结构、企业竞争优势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实现模型化，这方面的不足，有待于日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来弥补。我和我的团队从深入研讨国外的前沿文献开始，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然后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情况进行问题讨论和数据分析，形成研究思路和得出初步结论之后，再推进系统研究并撰写本书各章。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后发的经济体，在工业化启动阶段，由于要素的积聚和投入，特别是资本的积聚和投入，是推进工业化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企业效率和企业创新的重要性退居其次，如果不考虑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其他负面效果和后遗症，此时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来设立国有企业并协调国有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负面后果以及国有企业本身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不但国有企业的经营困境会交替出现，宏观经济也会不时受到大起大落和比例失调等种种窘境的困扰。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改革开放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更大的非国有经济比重与更好的宏观经济表现有着较强的的相关性。随着外延追赶工业化接近完成，改革步伐停滞的国有企业，

在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中起着增长抑制作用，构成了对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拖累。及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有助于消除增长抑制、卸去增长拖累，在避免过度进行总量刺激的情况下适度提高经济增速，以使中国经济顺利转入新阶段并使增长潜力得以挖掘、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是中国实行一揽子结构性改革的最重要环节之一。这就是本项研究的政策价值。

我们对本书并不满意，但这只是我们进行国有企业研究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将努力使以后的研究更深入，努力达到更好的成果。

张文魁

2015年3月

目 录 ...

第一章 着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中的国有企业	(1)
一、追赶型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国有企业：理论与实践	(3)
(一) 国有企业与工业化、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逻辑	(3)
(二) 我国国有企业的初期贡献	(7)
二、经济发展失衡：国有企业弊端的宏观表现	(9)
(一) 问题的出现	(9)
(二) 产生问题的原因	(12)
三、国有企业改革：体制转轨背景下提高企业效率的努力	(13)
(一) 20世纪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简要回顾	(13)
(二) 国外的有关情况	(16)
四、新阶段国有企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基于文献的现代 视角	(17)
(一) 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	(17)
(二)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	(19)
(三)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间的要素错配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	(21)
(四) 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与政策挑战	(23)
五、简要结论	(26)

第二章 国有企业地位的变迁与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	(27)
一、国有企业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	(28)
(一) 工业化之梦与苏联示范	(28)
(二) 我国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	(33)
二、国有企业发展在当时促进了经济增长	(37)
三、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弊端的显现	(41)
(一) 宏观经济大起大落和重要比例关系的失调	(41)
(二) 国有企业本身的弊病亦逐渐显现	(44)
(三) 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开始困扰政府	(45)
四、非公企业的进入与国有企业的“搞活”	(46)
(一) 1978 年之后大量非公企业诞生和发展	(46)
(二) 20 世纪 80 年代“搞活”国有企业	(47)
(三) 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开始发生变化	(48)
五、所有制竞争的强化与国有企业的困境	(51)
(一) 20 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逐渐陷入困境	(51)
(二)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有企业 3 年改革脱困	(53)
六、“双红利”的出现与新一轮国有企业大发展	(55)
(一) 改革重组红利	(55)
(二) 重化工业红利	(56)
(三) 21 世纪头 10 年后半段时期的“国进民退”争议	(60)
七、“双红利”的消失与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折	(62)
(一) “双红利”的逐步消失	(62)
(二)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折	(64)
(三) 增长阶段的转折与外延追赶工业化的收尾	(68)
八、增长阶段的转折的含义	(70)
(一) 既有增长模式难以持续，需要转向新增长模式	(70)
(二) 需要以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来消除对经济增长的抑制	(71)

(三) 国有企业本身的经营困境很有可能继续加重	(73)
九、简要结论	(74)

第三章 国有经济比重与宏观经济表现：对 21 世纪以来 的实证研究 (75)

一、研究背景和实证方法	(77)
(一) 研究背景和相关文献	(77)
(二) 研究方法选择	(78)
二、所有制结构优化可显著提高区域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增速	(79)
(一) 所有制结构优化对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79)
(二) 所有制结构优化对投资增速的影响	(80)
(三) 所有制结构优化促进区域资金流通、提升投资增速 的机制	(83)
三、所有制结构优化可降低经济运行中的通货膨胀压力	(84)
(一) 中国经济存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浦斯曲线	(84)
(二) 所有制结构优化可降低 CPI 平均涨幅	(84)
(三) 通过平抑物价上涨，所有制结构优化可对经济带来 广泛积极影响	(85)
四、所有制结构优化可增加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	(86)
(一) 所有制结构优化对出口占 GDP 比重的影响	(86)
(二) 所有制结构优化可增加外商直接投资	(86)
(三) 所有制结构优化是建设开放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	(87)
五、所有制结构优化可以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88)
(一) 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变化特点	(88)
(二) 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分离并分析潜在增长率变动 的平均规律	(91)
(三) 所有制结构对潜在 GDP 的影响的测算	(92)

六、增长阶段的重大转折与国有资本集中的主导产业的改革	(94)
(一) 国有资本集中的主导产业退化是2010年之后经济 增速下滑的直接原因	(94)
(二) 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的优化有助于实现中高 速增长	(99)
七、简要结论	(99)
附录 计量回归结果的参数及检验值	(100)
第四章 国有企业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提振效应分析	(105)
一、有关国有企业发展及经营效率的文献综述	(106)
二、对2003~2012年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效率及发展模式的比较	(109)
(一)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行业分布	(110)
(二) 国有企业的投资强度高于非国有企业	(111)
(三)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比较	(113)
(四) 国有企业对其他企业的溢出效应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	(123)
三、模拟国有企业改革对经济增速提振效果的可计算一般均衡 模型(CGE)	(127)
(一) 模型的基本特征	(128)
(二) 模型所反映的国有企业经济特征	(128)
四、国有企业改革对增速提振效果的数值模拟分析	(132)
(一) 模型中反映的国有企业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133)
(二) 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的设定	(134)
(三) 主要模拟结果	(134)
(四) 国有企业改革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分解	(137)
五、简要结论	(138)
附表	(139)

第五章 国有企业改革与产业结构演变和产业升级	(143)
一、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144)
(一) 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	(144)
(二) 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就是一部产业结构演变和产 业升级的历史	(147)
(三)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152)
二、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滞后阻碍产业结构演变和产业升级	(154)
(一) 我国产业结构演变和产业升级面临的问题	(154)
(二) 国有部门改革滞后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 负面影响	(155)
三、外延追赶工业化收尾期：企业创新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 主要驱动因素	(157)
四、国有企业的创新表现	(161)
(一) 国有企业创新呈现出明显的“高研发密度、低研发 效率”特征	(161)
(二) 国有企业在一般竞争性行业或技术变化快的新兴行 业的创新表现欠佳	(169)
(三) 国有企业在一些特殊和关键性领域有较好的创新表 现	(176)
五、简要结论	(178)
第六章 全球化进程中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建与国有企业 重组	(179)
一、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和中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概貌	(180)
(一) 中国的全球竞争力	(180)
(二) 中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181)
二、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概貌	(186)
(一) 总体情况	(186)
(二) 一些重要行业的情况	(188)

三、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深度分析	(194)
(一) 分析评价体系的构建	(194)
(二) 六大制造行业国内领先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测算	(196)
(三) 分行业国际对标评价	(199)
四、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建与国有企业的重组	(210)
五、简要结论	(215)
 第七章 总结：建立国企改革的新范式及政策挑战	(217)
一、研究总结和政策含义	(218)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范式与政策挑战	(221)
 参考文献	(231)

后记	(241)
----------	-------

第一章

绪论：经济发展 不同阶段中的国有企业

新中国建立以来 60 多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里，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而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以至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现机制和可持续机制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议题。更能引起关注和讨论的是，中国一直有着比较庞大和比较重要的国有部门，这不但未见于那些成熟经济体，也鲜见于众多的新兴经济体。因此，如果能够揭示中国国有企业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可信的逻辑联系，并建立可算的数量关系，一定很有意义。本书就是要从事这样一项研究。

我们将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审视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一个后发的、初始资本缺乏的追赶型国家，在工业化启动阶段和经济起飞初期，受到苏联的巨大影响，我国设立了大量国有企业，起到了快速积累有效资本的作用，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保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效率提升取代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贡献变量，如何克服国有企业的弊端就成了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关键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和非公有经济力量兴起，国有部门被迫迈向了改革和重组的征程。把国有企业放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大视野下进行观察，有助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过去 60 多年特别是过去 30 多年里，国有企业在各个阶段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在中国未来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如何评估国有企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但有学术价值，也有政策价值。

一、追赶型国家工业化初期的 国有企业：理论与实践

（一）国有企业与工业化、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逻辑

20世纪40年代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这个领域的先驱们一直强调工业化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看来，工业化是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工业化进程是推动现代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就认为，工业部门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刘易斯，1989）。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也指出，在一国经济起飞阶段，要实施优先发展主导部门的工业化战略，一个或几个新的制造业部门的迅速增长是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核心引擎（罗斯托，1988）。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提出的工业引导型增长模型（卡尔多—凡登定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中间阶段，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率最高且提高最快，工业部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趋势，对经济增长又具有长期累积效应。因此，卡尔多认为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卡尔多，1966）。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通过对全球101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证实了卡尔多的观点，认为经济结构的转变（主要是工业化水平提高），特别是非均衡条件下（要素市场分割和调整滞后等）的结构转变，能够推动和加速经济增长（钱纳里，1989）。此后，很多经济学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重要途径，在过去200多年的时间里，任何一个生产率水平与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国家都离不开工业化的发展过程。

在明确了工业化为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基础上，早期发展经济学进一步强调工业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并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